第 34 卷 第 3 期
2008 年 3 月

财经研究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4 No. 3
Mar. 2008

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化

赵红军[1,2],孙楚仁[2]

(1. 上海财经大学 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2.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经贸学院,上海 201600)

摘　要:文章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内生于"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当中,直接套用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对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并不一定具有太大的解释力,而将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这一双重制度变迁背景引入城乡差距模型中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的城乡差距。研究发现,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人口不自由流动条件下,城乡差距会发生多层分化,但即使如此,中国的城乡差距仍不太符合所谓的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

关键词: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人口流动;交易效率;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2-0121-11

一、引 言

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认为,收入、地区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一开始会扩大,而后会缩小,二者呈倒 U 型关系。但我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如该假说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扩大而后逐步缩小,相反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波动甚至上升。蔡昉,杨涛(2000)以及世界银行(1983)的研究结果显示,1952—1977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来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几乎要比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高出 1.1—1.5 左右。而 1978—1985 年间,城乡差距表现为逐步缩小,但 1985 年后却一直上升,1994 年后转入下降,1998 年以后又再次持续上升。Yang 和 Zhou (1999)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经历了两次"V 字型"变迁。Zhao 和 Tong(2000)在考察了省际、地区间、城市和农村四个层面的人均 GDP 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后发现,中国的城乡差距很难用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假说来解释。

收稿日期:2007-11-22

作者简介:赵红军(1970—),男,陕西白水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
孙楚仁(1976—),男,湖南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贸学院讲师。

对于这种违反“倒U型假说”的情形,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研究。李实、赵人伟(1999)认为,这主要源于我国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政策非常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潜力巨大,流动规模也颇大,但有关人口流动和职业选择的自由至今仍然受到很大程度限制。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则发现,仅仅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就能解释中国城乡差距变化的57%。蔡昉、杨涛(2000)从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一整套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及其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角度解释了中国城乡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ohnson (2000)将引起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限制、农村地区受教育机会欠缺以及城市偏向的投资和信贷政策等。何家栋、喻希来(2003)以及陆铭、陈钊(2004)等则从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偏向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等验证了其对中国城乡差距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现状、演进、形成原因等颇有裨益,但也存在不足,第一,这些文献仅着眼于一定时间段内二元结构或经济转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某一政策或者制度对于我国城乡差距影响的分析,而缺乏综合考虑中国面临的城市二元结构不断弱化以及经济转轨不断推进双重条件下中国城乡差距变化趋势的分析。事实上,这正是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差距变动趋势的重要制度背景;第二,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消除而市场化却不断加强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将表现为新的形式,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融入城市,而还有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仍处于流动状态,这时的城乡差距将出现分化;更进一步,这种城乡差距分化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等等,现有文献对此没有或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索性研究。第二部分将讨论二元结构、经济转轨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是一个二元结构、经济转轨条件下的城乡差距模型;第四部分是对模型结果的解释、现实对照及小结。

二、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与城乡差距的联系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政策、制度在城乡人口流动、迁移、受教育、就业、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差别待遇,而积极和良性的经济转轨也正不断推动着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社会福利、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乃至21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这两方面因素既相互交织,又相互融汇,必然仍是影响我国城乡差距的重要内、外部政策和制度条件(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2006)。

第一,这些制度和政策将首先通过影响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影响城乡差距的表现形式及其分化。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消除条件下,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仍未完全实现,所以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具

有较高知识、技术水准的人可能会被城市接纳;而那些知识、技术水准低、心理比较脆弱的人可能会重新回流到农村,也可能仍然选择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迁徙,过着候鸟般的流动生活,于是城乡之间的工资率、生产率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可能分化为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种是流动人口(包括回流农村的人口以及那些处于城乡中间状态的流动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二,这些制度和政策还将通过影响城乡之间的信息流通,贯穿城乡之间的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从而影响城乡之间的产品流通成本、流通效率。因为人口在城乡之间的不完全自由流动必定会阻碍城乡之间的贸易信息、农产品和工业品技术信息、质量信息的流通和传播,进而阻碍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流通和交易效率,而工业品和农产品不同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则通过影响城市和农村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在贯穿城乡之间的交通、道路、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不断增加,在投融资体制、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教育体制方面改革的加强,因此,城乡之间贸易活动的运输成本会由于市场化而不断下降,运输效率也会不断提高。比如,由于农产品具有标准化程度低、比较难于储存、质量比较难于辨别等特点,工业品具有标准化程度高、易于储藏、产品质量比较容易辨识等特点,因此可以推断,无论是从信息的传递效率还是从商品的运输效率来看,工业品都将具有相对于农产品的优势,而这种交易效率优势正如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导致城市和农村具有很大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不仅影响人口的流动,而且影响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流通成本和交易效率,因此,农村人将在一定程度上以更便宜的农产品消费替代部分工业品的消费,城市人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以相对更为便宜的工业品替代部分农产品的消费,于是就出现农村人的消费结构中农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城市人的消费结构中工业品占有较大比重的现象。

毫无疑问,这三种主要的机制都将决定城乡差距的现状、表现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那么如何才能模型化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对我国城乡差距的影响呢?

本文认为,如果要将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经济转轨这种双重制度变迁对中国城乡差距的影响引入模型,就必须在我们的模型中引入一个变量也就是交易成本,并用它来度量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条件下的制度和政策对“经济人”活动的影响,但直接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交易成本却会给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带来严重挑战(Hahn,1971;Kurz,1974;Krugman,1995 等)。因此,本文借助 Dixit-Stiglitz (1977)的模型法,并沿用萨缪尔森和杨小凯的做法,运用冰山交易成本技术,将交易成本转化为所谓的“交易效率”,也即假若一个消费者购买一单位商品或者购买一元商品时,实际

上他只会得到其中的k单位或k元,而其余的1－k部分要么是由于运输成本要么是由于交易成本而被消耗掉了,因此这k部分就称为“经济人”从事该笔交易活动的交易效率。

更进一步,在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条件下,城乡人口仍然会在受教育权限、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将面临着不同的交易效率,而这种交易效率将会首先影响城市和农村的消费结构,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城市人消费农产品的交易效率为基础变量,农村人消费工业品的交易效率为该基础变量的一个倍数,而流动人口无论消费农产品还是工业品均受到很大的政策和制度歧视,因此,假定他们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易效率为该基础变量的一个百分比,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冰山交易成本技术以及不同的交易效率倍数或百分比来度量城乡二元结构对交易效率以及不同人口消费结构的影响,而该消费结构还会影响整个经济的需求、生产、产品市场均衡、劳动市场均衡乃至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我们就可以从消费者实现最大化效用这一微观行为出发考察城乡差距;第二,二元结构、经济转轨就以一个主要变量即交易效率以及相关的交易效率系数进入一般均衡模型,我们就可以考察这种双重制度变迁对城乡差距的动态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只考察这种影响,对如何通过计量工具选择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代理变量,组成交易效率指标的计量和实证研究暂不考虑。下面我们将展开这一模型并考察这种双重制度变迁背景对城乡差距分化的影响。

三、一个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化的模型

在此假设:(1)中国的经济体中存在三个产业部门,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一个是现代的工业部门,还有一个公共产品生产部门;另假定农业部门只生产一种农产品,而工业部门则生产n种标准化的、同质的工业品,公共产品生产部门位于城市,只生产一种城市公共品,且农产品和工业品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

(2)由于二元结构政策的存在性,中国的经济主体实际上被划分为三类消费者,一类为农村人口,他们住在农村,以务农为生,人数为N_A;一类为城市人口,他们住在城市,从事工业品的生产,人数为N_B;一类为流动人口,他们在城乡之间漂泊,主要从事工业品或者公共产品生产,人数为$N_C=N-N_A-N_B$。由于农村居民只能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所以其效用函数形式为$u_A=z_A^{\alpha}(nx_A^{\rho})^{(1-\alpha)/\rho}$;而城市和流动人口则可消费农产品、工业品和公共品,其效用函数为$u_i=z_i^{\alpha}(nx_i^{\rho})^{(1-\alpha)/\rho}y_i^j$,$i=B,C$,其中:B代表城市人口,C代表流动人口;$z_i$代表他们消费的农产品数量,$x_i$代表他们消费的工业品数量,$y_i^j$代表他们消费的公共物品数量,当$i=B$时,$j=\beta$,当$i=C$时,$j=\eta$,其中β代表城市居民对

公共物品的弹性,η 代表流动人口对公共物品的弹性。另假设 p 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q 为工业品的市场价格,r 为城市居民支付的公共物品的价格,γ 为流动人口支付的公共物品的价格。每个消费者均有一单位劳动禀赋,因此他们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就是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所得的工资率。

(3)假定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为 f(labor, land)=min{labor/a,land},也就是生产一单位农产品需要 α 单位的劳动与一单位的土地,其中土地可无限开发;假定工业品的生产函数为 $Q_I = A_I L_{BI}^{\mu} L_{CI}^{v}$,生产公共品的生产函数为 $Q_P = A_P L_{BP}^{\zeta} L_{CP}^{\tau}$,且这些生产函数都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即 $\mu + v = 1$,$\zeta + \tau = 1$,其中 L_B、L_C 分别是雇佣的城市或者流动人口。农业由于没有土地进入限制因而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工业品和公共产品市场均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

(4)交易效率参数的假设。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的运输成本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地方保护色彩相对较低,所以特假定农产品和工业品在本地销售不产生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均为 1,而只有在运往外地时才产生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假设农产品运往城市的交易效率为 $t \in [0,1]$,而工业品运往农村的交易效率为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一个正的倍数 $\sigma(t)$,其中,$\sigma(t) \geqslant 1$,这样,工业品的交易效率就为 $\sigma(t)t$,并且 $\sigma(t)$ 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0 \leqslant \sigma(t)t \leqslant 1$。(2)$\sigma(1)=1$。条件(1)和(2)意味着当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演进较慢时,工业品的交易效率是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一个较大的倍数,但当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演进较快时,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交易效率优势就将缩小,并最终均趋近于 1。[①] (3)$d(\sigma(t)t)/dt > 0$,即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的增加,工业品的交易效率也随之增加。后者比较符合实际,因为一般情形下,工业品的交易效率比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得快。

1. 消费者行为。综上可得到农业人口、城市人口的决策问题分别为:

$$\text{Max } u_A = z_A^{\alpha}\left[n(\sigma(t)tx_A)^{\rho}\right]^{(1-\alpha)/\rho} \qquad \text{s.t.} \ pz_A + nqx_A = w_A \tag{1}$$

$$\text{Max } u_B = (tz_B)^{\alpha}\left[nx_B^{\rho}\right]^{(1-\alpha)/\rho} y_B^{\beta} \qquad \text{s.t.} \ pz_B + nqx_B + ry_B = w_B \tag{2}$$

$$\text{Max } u_C = (tz_C)^{\alpha}\left[nx_C^{\rho}\right]^{(1-\alpha)/\rho} y_C^{\eta} \qquad \text{s.t.} \ pz_C + nqx_C + \gamma y_C = W_C \tag{3}$$

问题(1)的最优解分别为:

$$z_A = \alpha w_A/p, \ x_A = (1-\alpha)w_A/nq, \ u_A = \frac{\alpha^{\alpha}(1-\alpha)^{(1-\alpha)} n^{\frac{(1-\alpha)(1-\rho)}{\rho}} \sigma(t)^{(1-\alpha)} t^{1-\alpha}}{p^{\alpha} q^{1-\alpha}} w_A \tag{4}$$

同理,问题(2)的最优解分别为:

$$z_B = \alpha w_B/(1+\beta)p, \ x_B = \frac{(1-\alpha)w_B}{nq(1+\beta)}, \ y_B = \frac{\beta w_B}{r(1+\beta)},$$

$$u_B = \frac{\alpha^{\alpha}(1-\alpha)^{(1-\alpha)} \beta^{\beta} n^{\frac{(1-\alpha)(1-\rho)}{\rho}} t^{\alpha}}{\gamma^{\eta}(1+\beta)^{(1+\beta)} p^{\alpha} q^{1-\alpha}} w_B^{1+\beta} \tag{5}$$

问题(3)的最优解分别为：

$$z_C=\alpha w_C/(1+\eta)p, x_C=\frac{(1-\alpha)w_C}{nq(1+\eta)}, y_C=\frac{\eta w_C}{\gamma(1+\eta)},$$

$$u_C=\frac{\alpha^{\alpha}(1-\alpha)^{1-\alpha}\eta^{\eta}n^{\frac{(1-\alpha)(1-\rho)}{\rho}}t^{\alpha}}{\gamma^{\eta}(1+\eta)^{1+\eta}p^{\alpha}q^{1-\alpha}}w_C^{1+\eta} \tag{6}$$

假定城市居民的工资 $w_B=1$,并且当流动处于动态均衡状态时有 $u_A=u_B=u_C$,由此可得：

$$w_A=\frac{\beta^{\beta}\sigma(t)^{\alpha-1}t^{\alpha-1}}{r^{\beta}(1+\beta)^{1+\beta}}, w_C=\frac{\beta^{\beta/(1+\eta)}\gamma^{\eta/(1+\eta)}(1+\eta)}{\eta^{\eta/(1+\eta)}r^{\beta/(1+\eta)}(1+\beta)^{(1+\beta)/(1+\eta)}} \tag{7}$$

这样得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和流动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分别为：

$$\frac{w_B}{w_A}=\frac{r^{\beta}(1+\beta)^{1+\beta}\sigma(t)^{1-\alpha}t^{1-\alpha}}{\beta^{\beta}},$$

$$\frac{w_C}{w_A}=\frac{(\beta^{\beta/(1+\eta)}\gamma^{\eta/(1+\eta)}(1+\eta))r^{\beta}(1+\beta)^{1+\beta}}{\eta^{\eta/(1+\eta)}r^{\beta/(1+\eta)}(1+\beta)^{(1+\beta)/(1+\eta)}\beta^{\beta}}\sigma(t)^{1-\alpha}t^{1-\alpha} \tag{8}$$

根据前面的假定 $d(\sigma(t)t)/dt>0$,因此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都逐渐扩大,并接近于一个常数,也就是取决于城市人口消费公共产品的弹性 β,城市居民支付的公共产品的价格 r,流动人口支付的公共产品的价格 γ,以及流动人口消费公共产品的弹性 η 等参数。

令 $H=\frac{\beta^{\beta}}{r^{\beta}(1+\beta)^{1+\beta}}, M=\frac{\beta^{\beta/(1+\eta)}\gamma^{\eta/(1+\eta)}(1+\eta)}{\eta^{\eta/(1+\eta)}r^{\beta/(1+\eta)}(1+\beta)^{(1+\beta)/(1+\eta)}}$

则 $w_A=H\sigma(t)^{\alpha-1}t^{\alpha-1}$,$w_C=M$。我们将在后面用到这两个简化记号。

2. 生产者行为。由于农业部分的生产技术是里昂惕夫技术,所以农业部分的零利润条件导致 $p=\alpha w_A$。工业品的利润函数为 $\pi_I=qA_I L_{BI}^{\mu}L_{CI}^{v}-L_{BI}-w_{CI}L_{CI}$,由于我们假定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结构,所以利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及零利润条件可得到：

$$L_{BI}=\frac{\mu^{1+\mu}(\mu+v)}{v^{2+\mu}}w_C^{2-\mu}, L_{CI}=\frac{\mu^{\mu}(\mu+v)}{v^{1+\mu}}w_C^{1-\mu}, L_{BI}=\frac{\mu}{v}w_C L_{CI} \tag{9}$$

假定公共品的价格以城市人消费公共品的价格 r 出售,而流动人口多支付的那些费用为多余征收费用,被相关部门侵占,于是公共品部分的利润为 $\pi_P=rA_P L_{BP}^{\zeta}L_{CP}^{\tau}-L_{BP}-w_C L_{CP}$,同样,假定公共部门的市场结构也是垄断竞争型,于是利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及零利润条件可得到：

$$L_{BP}=\frac{\zeta^{1+\zeta}(\zeta+\tau)}{\tau^{2+\zeta}}w_C^{2-\zeta}, L_{CP}=\frac{\zeta^{\zeta}(\zeta+\tau)}{\tau^{1+\zeta}}w_C^{1-\zeta}, L_{BP}\frac{\zeta}{\tau}w_C L_{CI} \tag{10}$$

3. 市场均衡。假定中国的人口流动受到较少限制,所以当流动达到均衡时,城市实现充分就业,则有：

$$N_B = L_{BI} + L_{BP} = \frac{\mu^{1+\mu}(\mu+v)}{v^{2+\mu}} w_C^{2-\zeta} + \frac{\zeta^{1+\zeta}(\zeta+\tau)}{\tau^{2+\zeta}} w_C^{2-\zeta}$$

$$N_C = L_{CI} + L_{CP} = L_{CP} = \frac{\mu^{\mu}(\mu+v)}{v^{1+\mu}} w_C^{1-\mu} + \frac{\zeta^{\zeta}(\zeta+\tau)}{\tau^{1+\zeta}} w_C^{1-\zeta} \tag{11}$$

同时均衡时，农产品、工业品和公共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N_A z_A + N_B z_B + N_C z_C = N_A/\alpha$$

$$N_A x_A + N_B x_B + N_C x_C = nA_I L_{BI}^{\mu} L_{CI}^{v}$$

$$N_B y_B + N_C y_C = A_P L_{BP}^{\zeta} L_{CP}^{\tau} \tag{12}$$

一般地，由于处于同一种技术水平上，生产工业品和公共品的生产函数一般相同，即 $\mu=\zeta, v=\tau, A_I=A_P$，则可求得：

$$N_B = \frac{\left(\frac{1}{\alpha}-1\right)\frac{\mu}{v} w_C N}{\frac{\mu}{v} z_B w_C + z_C + \left(\frac{1}{\alpha}-1\right)\left(1+\frac{\mu}{v} w_C\right)}$$

$$N_C = \frac{\left(\frac{1}{\alpha}-1\right) N}{\frac{\mu}{v} z_B w_C + z_C + \left(\frac{1}{\alpha}-1\right)\left(1+\frac{\mu}{v} w_C\right)}$$

$$N_A = \frac{\left(\frac{\mu}{v} z_B w_C + z_C\right) N}{\frac{\mu}{v} z_B w_C + z_C + \left(\frac{1}{\alpha}-1\right)\left(1+\frac{\mu}{v} w_C\right)} \tag{13}$$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所以流动人口 N_C 的户籍在农村，但其从事的却是城市工业品和公共产品的生产，赚取的是与工业品、公共产品相应的工资水平，但在城乡二元结构消失时，这部分流动人口将会融入城市，于是，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时按照户籍计算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城乡收入差距表达式便分别为：

$$URDI = \frac{w_B}{\frac{w_A N_A + w_C N_C}{N_A + N_C}} \tag{14}$$

由式(5)、式(6)和农产品零利润条件，可得：

$$z_B = \frac{\sigma(t)^{1-\alpha} t^{1-\alpha}}{(1+\beta)H}, \quad z_C = \frac{M\sigma(t)^{1-\alpha} t^{1-\alpha}}{(1+\eta)H} \tag{15}$$

将 N_i、w_i 以及式(15)等表达式代入式(14)，可得到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URDI = \frac{\frac{1}{\alpha}-1+\frac{M}{H}\left(\frac{\mu}{(1+\beta)v}+\frac{1}{(1+\eta)}\right)\sigma(t)^{1-\alpha} t^{1-\alpha}}{\left(\frac{\mu}{(1+\beta)v}+\frac{1}{1+\eta}\right)M + M\left(\frac{1}{\alpha}-1\right)} \tag{16}$$

根据我们的假定，$d(\sigma(t)t)/dt>0$，式(16)表明即使农产品交易效率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将扩大，并会趋近于一个常数，这意味着，若经济体中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则城乡收入差距不可能呈现倒 U 型状态。

反之，假定城乡二元结构消失，国家允许流动人口以各种形式取得城市户口，那么这时按照户籍计算的城乡差距将为：

$$URDI=\frac{\dfrac{w_BN_B+w_CN_C}{N_B+N_C}}{w_A} \tag{17}$$

同理，代入各种参数后的结果为：

$$URDI=\frac{M\left[\left(\dfrac{1}{\alpha}-1\right)\dfrac{\mu}{v}+\dfrac{\mu}{v}\dfrac{\sigma(t)^{1-\sigma}t^{1-\alpha}M}{(1+\beta)H}+\dfrac{M\sigma(t)^{1-\alpha}t^{\alpha}}{(1+\eta)H}\right]\sigma(t)^{1-\alpha}t^{1-\alpha}}{H\left(\dfrac{1}{\alpha}-1\right)\left[\dfrac{\mu}{v}M+1\right]} \tag{18}$$

由式(18)的比较静态模式可以发现：当 $\alpha\leqslant0.5$ 时，城乡差距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增加，但当 $\alpha\geqslant0.5$ 时，城乡差距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缩小。这意味着，当农产品支出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比重小于等于 0.5 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城乡差距会增大，而当农产品支出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比重超过 0.5 时，则城乡差距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缩小。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较大，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演进，结果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将会逐渐减少，因此，这意味着，在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乡差距一开始会缩小，但随着发展又会增大，呈所谓的 U 型状态。

四、理论解释、现实证据与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初步结论：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条件下，从单个经济人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以及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工资差距均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呈逐步上升趋势，并逐步趋近于一个常数；从整个经济体来看，按照户籍制度计算的城乡差距也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而扩大，并趋近于一个常数。

其次，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存在条件下，我们的理论预言，当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小于 0.5 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城乡差距会拉大；但当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大于 0.5 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演进，城乡差距会减小。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较大，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的演进，结果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将会逐渐减少，因此，这意味着，在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乡差距一开始会缩小，但随着发展又会增大，呈所谓的 U 型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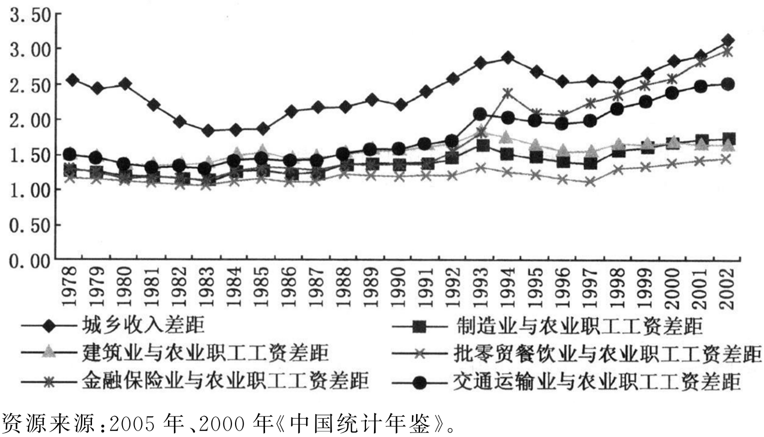
再次,从我们的模型与他人研究的结论来看,我们的模型同 Zhao 和 Tong (2000),Yang 和 Zhou (1999)以及蔡昉、杨涛(2000)一样,至少是暂时否定了倒 U 型假说。

最后,从与现实的对照来看,目前国内的统计年鉴中还查不到专门有关流动人口工资的比较规则的数据,因此我们难以对本文的结论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但图 1 所示的 1978—2002 年的城乡差距上下波动,制造业、建筑业、批零贸餐饮业、金融保险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与农林牧副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之间波动的同步性以及很高的相关系数(见表 1)却能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一些间接证据。

表 1　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工资差距

相关系数	制造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平均工资差距	建筑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平均工资差距	批零贸餐饮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平均工资差距	金融保险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工资差距	交通运输业与农林牧副渔业工资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0.84491	0.684233	0.808346	0.807314	0.84

资源来源:2005 年、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源来源:2005 年、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1　1978—2002 年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按行业划分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

如图 1 所示,1993 年以前,城乡收入差距与这五个行业与农林牧副渔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波动同步。1993 年以后,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零贸餐饮业与农林牧副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仍保持同步,但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与农林牧副渔业的工资差距则拉大。本文的解释是,这些行业与农林牧副渔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之所以和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恰恰表明,中国的二元结构和经济转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是影响中国城乡差距的重要制度变量。1986 年之前,城乡差距和这些行业工资差距之所以保持在一个比较低而基本稳定的水平上,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的经

济改革发生在农村。而1986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城市，随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了高潮，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大批的流动人口，中国经济真正进入了市场化的阶段，在城市比较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因此也得到了很快发展，于是，城乡的收入差距和这些位于城市的行业与农林牧副渔业的工资差距也逐步拉大。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建筑业、批零贸餐业与农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没有太大变化，但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与农林牧副渔业的工资差距则逐步拉大。我们的解释是，这些行业实行国家垄断，人才进入的壁垒较高，结果限制了流动人口的大批进入，所以其与农林牧副渔业的工资差距拉大，与此相反，由于制造业、建筑业、批零贸餐饮业的市场化程度高，流动人才进入比较容易，所以其职工与农林牧副渔业的工资差距基本保持了稳定。

总之，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我们不能对本文的结论进行准确的计量检验，但本文的理论还是比较准确地抽象和概括了中国的现实。比如，当前有关城乡收入差距的分化国内尚无人进行研究，我们的模型就解释了这一点；还有，现有的研究均着眼于某一时间段内城乡差距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则预言了我国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较长时期变化趋势。当然，我们的模型也存在很多粗糙和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就构成我们今后继续前进的起点和动力所在。

---

* 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05JA790019)、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经济兴衰的源泉和机制”(2006031)项目以及上海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交易效率、贸易差距、贸易一体化”(06MS031)、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贸易发展研究会一般项目“中国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资助。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 Fujita-Krugman(1995)假定农产品交易效率和工业产品交易效率是两个独立参数，它们在模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两个参数内在是统一的，它们对经济体的作用是一致的，只是其大小有别，原因主要是这两种产品的性质不同所致。

参考文献：

[1]Chen, Aimin. Urbanization and disparity in China: Challeng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407－411.

[2]Ding L. Rr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 Impact of growth, 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local growth welfare[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419－429.

[3]Yang X, Rice R. 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4, (25): 346－68.

[4]Johnson D Gale. The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Rural China[R].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February 27.

[5]蔡昉，杨涛.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 中国社会科学，2000，(4).

[6]何家栋，喻希来．城乡二元结构是怎样形成的[J]．书屋，2003，(5)．
[7]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2，(3)．
[8]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7)．
[9]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89．
[10]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11]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1997，(2)．
[12]Galor，Oded，Tsiddon，Daniel.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The Kuznets hypothesis revisited[M]. Volume (Year)：1996，63，Issue (Month)：250 (Suppl.)：103－117.
[13]尹恒，龚六堂，邹恒甫．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J]．经济研究，2005，(4)．
[14]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转轨经济内生发展的模型及其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06，(5)．
[15]孙楚仁．一个改进的交易效率与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2006，(11)．

Dual Structure，Economic Transi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ZHAO Hong-jun[1]，SUN Chu-ren[2]

(1.*Postdoctoral Center*，*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Shanghai* 2016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of the view that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is endogenous in economic man's pursuit of his own utility maximization，and that the Kuznetz-Williamson Hypothesis is inapplicable to China's situation. Our model with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du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hows that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will become smaller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free migration，while under non-free migration there will be a fragmente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even under this situation，Kuznetz-Williamson Hypothesis is also inapplicable.

Key words：dual structure；economic transition；migration；trade efficiency；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责任编辑　许　柏)